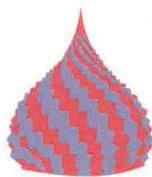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译丛 王加兴 主编



Русские в XX веке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族人



Вдовин А. И.

[俄] 亚·伊·弗多文 著 郑振东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译丛 王加兴 主编

Русские в XX веке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族人

Вдовин А. И.

〔俄〕亚·伊·弗多文 著 郑振东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族人 / (俄罗斯) 弗多文著 ; 郑振东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5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译丛 / 王加兴主编)
ISBN 978-7-305-14455-4

I. ①二… II. ①弗… ②郑… III. ①俄罗斯族—民族历史—俄罗斯—20 世纪 IV. ①K5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5688 号

РУССКИЕ В XX ВЕКЕ

Бу Вдов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Copyright © 2004 Бу Вдов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5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Nanjing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 图字:10-2010-0000000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译丛
书 名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族人
著 者 [俄罗斯]亚·伊·弗多文
译 者 郑振东
责任编辑 李振权 李鸿敏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40.75 字数 610 千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455-4
定 价 9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文版作者序 | 后苏联历史中的俄国和俄罗斯民族

八月革命。1991年8月19—22日间发生的事件,已经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一场动乱而被载入史册。它们与接下来发生的种种事变——苏联的解体、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炮轰俄罗斯议会大厦、取缔苏联政府、1993年12月12日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一道,被申辩者称之为“革命”,而声讨者则称其为“反革命”。这些事变,就其演进的深度与特征而论,毫无疑问,是具有革命的性质,故用八月革命或变容节^①革命作为这些事变的象征性符号,是可以被视作能为世人所接受的。^②

克里姆林宫技术服务处工人B.库兹明和B.阿尔希普金的举动,成为我国现代历史中一个时代的更迭的象征性标志:12月25日19点38分,他们降下了总统官邸楼顶旗杆上那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旗,并于19点43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升起白、蓝、红三色条的俄罗斯国旗。^③亦在那一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更名为俄罗斯联邦。1991年的这场革命,需要历史根据,于是启动了对俄国人民先前经验的重新审视和对新的历史观念的锻造。

① 变容节,全称为主显圣容节(Преображение Господне),基督教主要节日,典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7章第2、3节。耶稣与弟子彼得、雅各、约翰上山祷告时,忽形象大变:脸若太阳发光,衣衫洁白如雪,还有先圣摩西、以利亚侍立两旁与之交谈。后人遂立是日(公历8月19日)为节,以作纪念。1991年事变恰始于此日,故有此说。——译者注

② 1991年革命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行动(8月19—22日)及他们的被捕(22—29日)。依据莫斯科委员会的决定,8月28日Ф.Э.捷尔仁斯基的纪念像被拆除(这成为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终结的象征),苏共中央委员会被驱逐和下达关于中止俄联邦共产党活动的指令(8月23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宣布独立(8月24日),米·谢·戈尔巴乔夫卸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全权职务(8月25日)。

③ 那面三色旗早在8月22日中午便已在俄国政府大厦上空升起(是日如今被作为“俄联邦国旗日”来庆祝)。

对待俄国现代史所采取的社会形态方法论。在先前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方法论框架内,苏联时期的历史,通常被描绘成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且后者会随后循着由不发达形态向较为发达形态的成熟阶梯而升华的一个阶段。已经抵达的诸阶段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曾被官方称之为“发达的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的意外破产,对这一阶段的诠释,令许多社会形态方法论的追随者们觉得并不准确。他们认为,将这一阶段作为“初期社会主义”的阶段之一来谈论,当更为正确些。^① 这个“初期社会主义”在达到发达形态之前,尚需在许多方面做好准备。而社会主义的信徒们认为,否定这一方法论是一种历史错误,或是一种犯罪。

依据阶级观点,1991—1993年间的苏联,曾实施了一场“反苏的国家政变”——这是由“新俄罗斯人”阶级及他们的盟友(即影子资本^②,已蜕变的党、政、经济官僚们,知识界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别,工人阶级中的边缘化阶层,贵族、富农们的后代,等等)所成就的。一大批昔日的党、政官员们,转入新的执政阶级。“在改革时期已经动摇了的、掩盖在‘苏联政权’幌子下的干部任命制专政体系,又在一个新的‘民主主义的’幌子下,惶恐不安地为自己寻找维系其社会特权的救星。并且,这样的救星他们找到了,那便是一马当先‘与特权斗争的斗士’、先前(即在改革初期)曾一度极受人们欢迎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在苏联时期已经变了形的“无产阶级专政”,被转交至新人手中用来置换财产。一些知名的俄国历史学家们判定,1991—1993年间,“是官吏与官僚集团实施了反革

① 全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取向的俄国学者”在《庆祝伟大十月革命80周年》的纲要中断言:“从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先决条件视角来看,苏联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直至1991年崩溃之前,也未能超越初期社会主义的历史范畴,没有完成过渡时期的种种任务。”尤·弗·安德罗波夫有一次称:“鬼知道那是个什么发达社会主义。在普通社会主义到来之前,我们还得耕耘再耕耘。”

② 影子资本,系八月革命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据一些经济学家评价,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劳动者收入约七分之一,被影子经济商人攫为己有;20世纪80年代时为18%;至1985年时为21%;1989年时为25%。尤·弗·安德罗波夫在展望苏联未来时注意到这一状况,曾预言道,如果我们无所作为,那么,“这些积蓄起来的巨大商业资本,便将会图谋合法化并炸毁苏联政权”。

命政变。他们获取了全部政权。并且现如今,他们就像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们一样生活着”^①。

私有制,作为后苏联时代国家经济体系的基础,获得了联邦宪法(1993)的确认。该宪法宣告:“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私人的、国家的、自治市镇的及其他一些类型的所有制,均受到同样的承认和保护。”新的所有制阶级的形成,是在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进行私有化的过程中和遏制对这一过程的阻抗中实现的。据阿·鲍·丘拜斯^②所见,“在俄国推行私有化所要完成的一个主要使命,便是阻止共产主义”。且这项使命,已于1996年7月总统大选之前基本完成。是时,来自亲共势力方面的总统大位主要竞争者根·安·久加诺夫^③,“放弃了私有财产国有化的口号”。接下来,新的俄罗斯政府,成功反击了欲对私有化结果予以重新审视的图谋。^④“我反对再度改变所有制,”弗·弗·普京在2001年4月3日致议会的咨文中称,“再度改变所有制,可能对经济和社会环境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我是重审私有化结果的坚决反对者,哪怕重审的根据是这些结果不理想;因为我深信,这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任何的去私有化和对私有化结果的重新审视,都不会发生,但所有的人,都应当学会依法生活。”他在2003年11月4日接受意大利大众传媒访谈时,曾如是坚称道。

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成功的尝试,似乎证实了那个有关“历史的终结”的论点是正确的。此论所指的是:处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那部分人类,今后,将

① 据1995年数据资料显示,苏联官员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商业精英中占61%。在后苏联高级别政治和经济精英(即高级领导人、各政党领袖、区域精英、政府领导、商业精英)中,苏联官员出身者,共计为69.9%(O. 克雷什塔诺夫斯卡娅)。

② 即阿那托里·鲍里索维奇·丘拜斯(Чубайс, 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1955—),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私有化的积极推动者,曾任俄罗斯国有财产国家管理委员会第二副主席(1991—1994)、俄联邦副总理(1992—1994)、总统行政事务管理局局长(1996—1997)、财政部长(1997)、第一副总理(1997—1998)等职。——译者注

③ 即根纳季·安德列耶维奇·久加诺夫(Зюганов, 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1944—),俄政要,哲学博士,曾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副部长(1989—1990)、俄共中央政治局成员(1990年起)、中央委员会主席(1995年起)、俄共联盟委员会主席(2001年起)等。——译者注

④ 据官方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国家所有制计为11%,而与此同时,在全世界却出现了国有经济成分提高和加强的态势:瑞士的国有经济成分为60%;英国和意大利已达到40%。

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发展起来。美国教授弗·福山^①在《历史之终结》一书(1989)中断言:“西方、西方思想的凯旋,是明确无疑的。这首先是因为,在自由主义那里,没有任何其他有生命力的选择。”

据此观点看来,原来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绝路之一;它已经在迫使走上这条绝路的人民回归到历史主干道上来,与人类的那个“先进的”部分汇合。此种境况之下的汇合,意味着一种文明同意被另一种文明所吸纳。关于这一吸纳所引发的后果,著名的俄国思想家尼·雅·丹尼列夫斯基^②早在1869年便曾写道:“一种文明对另一文明的政治上的、进而文化上的吸纳,将导致被吸纳文明的停滞,随后是退化和衰落。”当今之世,有关历史的终结和社会进步单维度性的思想,常令越来越多的权威性的世界科学界代表人物们觉得不可接受和根据不足。例如,国际社会学联合会会长彼·施托姆普卡^③认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均应依照欧洲中心论模式做直线性的、不折返的和递进式的发展,这一理论正在被历史进程所推翻,且它明显地低估了人类其他文明和发展模式的潜能。(施托姆普卡 П.《社会变迁社会学》,莫斯科,1996)

社会主义思想在苏联及世界其他一系列国家的溃败,无论如何都已是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所持有的社会形态观念的信仰。这种观念的基础,是由历史各阶段的物质财富的不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卡尔·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特点与私有制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曾被视为资本主

① 即弗朗西斯·福山(Фукуяма, Фрэнсис Ёсихиро, 1952—),日裔美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文中所引书名全称为《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另有《苏联与第三世界:过去三十年》等著述。——译者注

② 即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1822—1885),政论作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泛斯拉夫主义代表人物。在代表作《俄国与欧洲》中提出“独特文化—历史类型”说,论证斯拉夫种族将发展成一个全面的独特文化—历史类型。其思想为沙俄大国沙文主义张目。——译者注

③ 即彼得·施托姆普卡(Штомпка, Пётр, 1944—),具有国际声望的波兰社会学家,有《理论社会学与社会学设想》、《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学使命》等著述。——译者注

义发展的主要推动力。^① 尽管这一观念,毫无疑问,在对逝去的那些时代予以描述时,尚未穷尽自己的潜能,但其预见性能力,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怀疑。

自 1943 年起——是时,第三国际这个将各国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著名国际组织被解散——在我国及世界上,那首号召“工人们,起来! / 列队出征! / 前进、前进、前进!”的共产国际之歌,便演奏得日益稀少;正在衰弱的还有那个信仰——“列宁主义的光芒照耀着我们的道路, / 全世界起来向资本发动进攻! / 两个阶级在最后的战斗中拼争”;“我们的口号——全世界苏维埃联盟”,亦早已失去现实意义,实质上已成为被弃于历史档案馆的过时之物;笃信在不久的未来“所有国家都会燃起起义篝火”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徒们,已是所剩无几。与此同时,那些认为“红色阵线的我们是一支战斗的队伍/我们不会退出我们的道路”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人们,以及其他一些政党的党员们,现在依然存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因在自己的行列中有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与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密切结合,亦对许多国家的现实生活继续构成积极的影响。^②

文明方法论。在某些方面与社会形态方法论十分相近的,是所谓的对待人民与国家历史所持的文明方法论。这一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始于蒙昧,进而野蛮,继之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形态。于是,社会主义曾被描述为最高类型的文明。尼·伊·布哈林^③曾于 1928 年言道:“我们正在创造,且我们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文明,面对这种文明,资本主义的文明将会看上去如同在贝多芬

① 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性质与私有制占有形式之间的主要矛盾,可以通过矛盾一方的获胜而得到解决,即生产的社会化应当战胜私有制占有形式。这一推测是错误的。“辩证矛盾是不能通过其一方的获胜而得到解决的——它的解决通常是通过综合方法,即将这些矛盾的斗争与统一过渡到一种新的、更高的水平。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亦确保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长达 250 年的不断完善与发展。”(见 <http://www.apn.ru/publications/article21867.htm>)

② 据一些评估所示,如今在俄罗斯,有 5% 的平民和 20% 的知识分子信奉自由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与“俄罗斯民众于最近的‘黑色 20 年’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的、爱国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整合思想”完全相悖。(《昨天》,2009 年,第 49 期,第 3 页)

③ 即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Бухар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88—1938),苏联政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济学家、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1938 年被以反革命罪处死。重要著述有《过渡时期的经济》、《共产主义 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译者注

英雄交响曲面前的‘狗跳华尔兹’。”现如今所见到的发展中的领先者,却是另样的:“数十个西方国家走在前列,而其余的国家正在追赶。”(Л. И. 谢梅尼科娃语,1998)人们认为,现代化的主要使命便是“将社会转换成一种新质,消除滞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状”。最为经常地被拿来作为文明样板的,是美国;落后国家通常是以它为定位来“进行现代化”的。

然而,在做最近距离仔细观察时,人们时常会发现,诸落后文明所采用的这种发展战略,是不能实施的。因为,由于地球资源的限制,按照美国样式对整个人类进行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地球资源中最大最好的那一份,正是由美国来享用的。世界生产总值中约 20%是由美国产出的,而被它消费掉的却占约 40%。共计占地球居民人口约 5%的美国人(2006 年 10 月美国人口跨越 3 亿界限),正在消耗全球能源的 23%,吃掉 15%的肉类;全球汽车总量的 37%行驶在美国的公路上。现今,一个美国人与地球上一个中等水平的居民相比,所消费的能源要高出 3 倍以上,所消费的水高出 2 倍,所产出的垃圾高出一倍,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高出 4 倍。美国在消耗世界已开采原料的一半和四分之一以上的石油的同时,地球大气中有三分之一的有害废物是由它排放出去的。一位美国公民的薪金(每年 3.97 万美元)差不多是中等水平国家居民收入(8.54 千美元)的 4 倍。在美国,官方设定的贫困线标准为每日 50 美元,而在地球上的其他 35 亿居民那里,每天花去两个美元的可能都没有。据国际标准,每天人均收入 2~4 美元被视为贫困,低于 2 美元被视为赤贫。

如今已形成了一个“黄金十亿”地球居民的概念,即 70 亿地球居民^①中,有 10 亿人居住在科技发展已达到高水平的国家——美国、加拿大、西欧一些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② 这些国家的公民,享有全球已产出能源的 70%、金属制成品的 75%和全球木材的 85%。2001 年时,“黄金十亿”享用了全球食品的差不多 85%(1960 年时为 70%),占有全球贸易的 84%和金融积蓄的

① 据研究组织人口咨询局预测,这个数量会在 2010 年达到。(详见 <http://www.novopol.ru/text73303.html>)

② 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所谓亚洲之龙)未被纳入“黄金十亿”,它们几近达到(而新加坡已超过)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85%。1960年时,世界20%最富有之人与最贫穷之人的收入之比为30:1;1970年时为32:1;1990年时为60:1;2000年时为100:1。^①这类比值继续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走向在“提升”;而那种希图依靠牺牲门外汉利益而使“黄金十亿”的规模有所扩大的期望,实际上是在剥夺这个星球五分之四居民的前途,是在使他们成为地球生活节日中的多余者。

看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阿·汤因比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曾警告说:“关于将西方经济体系作为人类历史共同和不间断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并要在此基础之上统一世界的论点,将会导致对事实的极其粗暴的曲解和大大缩小历史的视野。”

文明论与任何其他理论一样,享有存在的权力,可它并非人类的万应灵丹。尽管它有一系列的长处,但一些会引起严重后果的谬误,亦是其本质上所固有的。“文明的范式”自诩为解读历史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论,曾一度完全控制了一些人的思想,被作为政治战略的基本依据,并“有将世界倒转至十字军远征和堂·吉珂德那个时代的危险;但却有一点不同——人们不再是用刀箭与盾牌去征战,而是动用携带原子弹的导弹、电子和信息武器”^②。不久之前,发生在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种种事件,便是当今世界在人权和主张新文明秩序旗号下发动的第一批“十字军远征”。

引起世人关注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文明方法论框架内的诸文明,时常被依据完全随意的方法加以类分。时至今日,仍未能揭示出可以作为区分诸文明依据的客观标准。^③因此,文明数量的多寡,在不同的作者那里大相径庭,直至

① 见 <http://www.glazev.ru/associate/500/>。

② 沙赫纳扎罗夫 Г. X.:《文明论的启示与迷茫》,莫斯科,2000年,第5页。

③ 在科学文献中,“文明”这一术语被用于不同的语义:1. 系文化的同义语(A. 汤因比、B. O. 克留切夫斯基);2. 系地方文化发展的终结期,即它们的递减或衰落期(O. 施本格勒);3. 系人类社会中取代野蛮的一个历史阶段(Л. 摩根、Ф. 恩格斯);4. 系社会的一种历史—文化史类型(Н. Я. 丹尼列夫斯基);5. 系社会的社会化组织;6. 系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发展水平或程度(如古希腊罗马文明、欧洲文明、印加文明,等等);7. 系与某种宗教影响有关联的社会精神生活程度(如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见瑟乔夫 H. B.:《多成分经济学》,莫斯科,1999年,第146页。)

将任何一个民族都划为一个单独的文明。在文明的康庄大道上走在他国之前的那些国家,它们的历史,时常被用得到肯定性评述的历史事实、现象、过程和人物粉饰起来;而有关“不文明”国家历史的著述,却是充斥着负面信息和反派人物。所有这些,在许多于近数十年间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教材中,亦有所见。它们在许多方面会使人们联想起 1920—1930 年间问世的、出自著名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①学派史学家们笔下的那些历史著述。仅以否定观点来展示革命前的祖国历史,曾是这些史学家们的主要使命。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自由派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中,苏联的过去,是祖国历史中突然而至的一个最黑暗时期——一连串企图实现社会乌托邦的冒险尝试、极权主义、具有非人性化面孔的行政命令体制、毫无理性的镇压、领导人物的性格偏执和体弱多病、对各族人民的横暴行径、国家在停滞不前的历史泥淖中沉沦。在中小学和大学里,借助这种“文明”方法所能培养出来的,只会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反爱国主义者、内在的和外在的侨民。

协同方法论。对待历史所持有的社会形态方法论和文明方法论,将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形容成按照某种“先进样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线性提升,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方式的过渡;这两种方法论的局限性,被所谓的对待历史的协同方法论所克服。这一科学方法的出现,与比利时的俄裔学者伊·罗·普利戈任^②和德国物理学家日·哈肯^③的创作相关。前者于 1977 年因非平衡系统热力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后者则于 1973 年为他所研究的激光辐射中

① 即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8—1932),苏联政要、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领军人物、科学院院士,历任俄联邦教育副人民委员(1918—1932)、苏共中央执委会委员等。主要著述有《俄国史(远古至混乱时期)》、《简明俄国史》、《俄国文化史概要》、《十月革命史》等。——译者注

② 即伊里亚·罗曼诺维奇·普利戈任(Пригожин, Илья Романович, 1917—2003),亦为化学家,在莫斯科出生,1921 年移民国外,先后至立陶宛、德国,1929 年移居比利时,1960 年起在美主持一个复合量子系统研究中心直至去世;1984 年曾为苏联外籍科学家。——译者注

③ 即日耳曼·哈肯(Хакен, Герман, 1927—),理论物理学家、协同论创立者。——译者注

的自组织效应命名为“协同作用”(源自希腊语的 *synergeia*, 意为共同的、协调一致的作用)。如今已经探明,这种辩证的认知方法,具有通用性,可用于理解社会发展诸规律。协同论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跨学科的贯通型理论的角色,正积极地成为历史科学的一种方法论。

协同方法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些概念之上的,即发展的非线性、非稳定性、无法预料性和多选择性。它令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对历史过程中不稳定状态发展的新颖观点,这需要顾及那些无法预知、无法预测的各种意外,一些微小的相互作用对发展的影响。发生于分流点,即进程的分支点上的发展,对理解历史具有特别的意义;那个点,通常是新的演化路线的起始点。标志着社会系统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革命,便是一个鲜明的历史实例。与分流概念有着密切关联的,是有关所谓引力体的概念。尼·尼·莫伊谢耶夫^①院士以下述方式对这一关联作出解释:任何一个自然界的动态系统的发展,均发生在某一引力体内,即一个系统的稳定或亚稳定状态中的一个有限的“引力区域”内。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可能拥有大量的引力体。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过大的外部负荷或振动的蓄积(即社会矛盾的蓄积)——状态终有一天会发生质变,于是系统亦将会相应地快速转入一个新的引力体,或汇入一个新的演进渠道。系统的这种重建,被称之为分流。

这一新的方法论与那些古典方法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在古典科学范围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决定论,而偶然性则被视为次要的、在诸事件的总径流中不会留下痕迹的因子。不平衡性、不稳定性,通常被理解为某种否定性的、具有破坏作用的、正在脱离“正确”轨道的发展,这种发展被想象为没有选择余地的发展。在协同论中,进化论思想与历史进程的多方案性和历史的多维性相结合。从协同论的立场来看,人类历史中的 20 世纪,乃是一个真正的分流的世纪。关

^① 即尼基塔·尼古拉耶维奇·莫伊谢耶夫(Монсеев, Никита Николаевич, 1917—2000),普通力学与应用数学学者。——译者注

于这一点,著名科学哲学家欧·拉兹洛^①的著作亦给予了证实。^②诚如《协同论与未来预测》(2001)的作者们所论及的那样:“非线性数学、协同论的发展,以及与其一道发展着的对世界、对世界中的生活状态的新观点,不是一种时髦,而是科学和文化发展的一个自然阶段。”

协同方法论揭示了自然界和社会中那些被研究过程的复杂性,但是,很难指望这种方法会于最近时间内在创作有关祖国历史的总结性著述中得以运用。应当注意到由社会学家们所破解的那些课题的特殊性。于20世纪在自己的领域内取得了卓越成就的物理学者们,认为他们的学科所研究的是“自然界现象中最简单,同时亦是最一般的规律,物质的特性和结构及其运动的法则”(亚·米·普罗霍罗夫^③语)。史学家们正面对着类似的任务,面对着必须查明国家和俄罗斯社会发展中最一般的规律的任务。不过,完成这样的任务,时常令他们感到比较困难,因为,作为一个认知客体,社会要比自然科学和“精密”科学所研究的客体,更为复杂。众所周知,“使原子核发生裂变,要比打破人们意识中的成见容易许多”(阿·爱因斯坦语)。

历史是由数十亿有着理性与情感的生物们所创造的。他们在生命的不同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解决着自身的和并非依自身愿意而被纳入其间的诸群体的种种问题。每一国家的历史,均是一定人群的命运史,是他们的相互关系、在集体和社会性联合体中的地位的历史,是他们对家庭、组织、国家事务的参与。一个人,自降生之日起,便已置身于社会生活各层面(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等)相互作用的交会点上,且在所有这些领域内,都会留下或大或小的可见印记,留下创造与成就的果实。

客观性。完整地理解个人、社会 and 全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关系,

① 即欧文·拉兹洛(Ласло,Эрвин,1932—),匈牙利哲学家,主攻整体论、系统论、未来学、宇宙学等。——译者注

② 拉兹洛 Э.:《分流的世纪·对变化着的世界的理解》,载《路:国际哲学杂志》,1995年第7期。

③ 即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普罗霍罗夫(Прохоров,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1916—2002),苏俄著名物理学家,量子电子学奠基人,1964年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激光技术发明者之一。——译者注。

是极其困难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种种重大变革,又使这一问题成倍地复杂化。亚·彼·洛古诺夫^①的文章《祖国历史编撰学文化》(2001),对历史编撰学中过渡时期的这种情势,有很好的实例说明。他曾对一些候补博士和博士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有关祖国历史的学位论文进行了分析。这些论文的 authors 声称与苏联历史编撰学如下品质决裂:过度政治化(占71%)、意识形态化(占58%)、缺乏提出并破解选定课题的能力(占42%)、研究人员公然作伪的取向(占13%)、一小撮史学家的垄断(占14%)。

这些学位论文的作者,大多声称他们的研究属于“新传统”。其研究的新颖之处,依作者们自己界定,是对解读历史过程的社会形态方法论的摒弃(61%),是依托于文明的和文化学的方法论(73%),是社会形态方法、文明方法和文化学方法的合成(28%),是对研究课题进行的全面的研究(14%)。

方法的多元化,一般说来是已经出现了,但是,这并不会令历史学家们不必去描绘真实的历史画面。有关自己国家及其现状的准确可信的知识,对每位当代人均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人,只有当其清晰地认知了自己的祖国,才有可能成为有益于祖国之人”(彼·雅·恰达耶夫^②语)。历史教科书,便是用于促成这种认知的养成;换言之,是促成良好的历史观的养成;是在学生心中促成不唯是必不可少的知识的积累,亦有优秀的公民品质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形成。

亦有必要提醒,历史学家本身也应当具备这些素养。只有这样,他才能与自己所负使命的崇高相符。我国历史编撰学的鼻祖尼·米·卡拉姆津^③曾这样写道:“史学家应当与自己的人民同喜同忧。他不应受制于嗜好的指使去曲解事

① 即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洛古诺夫(Логу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1954—),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历史系主任。——译者注

② 即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Чадаев, Пётр Яковлевич, 1794—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因在其《哲学信札》中抨击俄国专制制度、农奴制而受到政府迫害,另有《狂人的辩护》等著述。——译者注

③ 即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Карамз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作家、史学家、贵族和开明专制主义思想家。俄国感伤主义奠基人,代表作有《俄国旅行者信札》、《贫穷的丽扎》等。曾主编《莫斯科杂志》、《欧洲通讯》。《俄罗斯国家史》是其主要的史学著述。——译者注

实、夸大幸福或在自己的叙述中缩小不幸；他应当首先是诚实的；但也许，甚至亦应当怀着忧伤的心情将本民族历史中那些令人不快的、可耻的东西表述出来，而在会带来荣耀的地方，在谈到种种胜利、谈到繁荣昌盛的景象时，则应怀着喜悦和热情来表述。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成为一位史学家首先应当成为的民族史实记述者。”

伟大的亚·谢·普希金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早就不再为我在周围所见的一切而感到激动了……但我用人格来起誓：我不会打算因为世间任何东西而变更祖国；或是除了我们先祖的历史、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这种历史之外，还有另样的历史。”这番话语中所包含的，不仅是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亦有对显而易见之事的判定。一个民族不可能有另样的历史，即便非常希望如此。往昔对历史学家和对所有人一样，是独立于他们的意志之外的；它可以被认知，但不可以被更改。这里亦适于回想起著名史学家瓦·奥·克留切夫斯基^①的那个见解——真实的历史、历史教育、历史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民族之存在的不容置疑的条件：“若是没有历史知识，我们便应承认自己是随机的；承认自己不知道如何与为何来到这个世界，如何与为何生活在这个世间，如何与为何应当努力向前。”这位学者针对自己的同胞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认为：“为了成为一位自觉和自愿发挥作用的公民，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或多或少的是个历史学家。”

无偏见的历史——这是诚实的研究者和爱国者的产物。列·尼·托尔斯泰曾描写过福音书中的戒律“莫作伪证”对历史学家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对待历史的座右铭，我应写上：‘毫无隐瞒。’完全不说假话，这还不够；还应当力求不消极对待不说假话，即故意避而不谈。”现代历史学家瓦·德·索洛韦伊^②的论断是公正的：“只有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承认他们的绝对价值的人，才可能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作出客观的描写。爱国主义，这

① 即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留切夫斯基(Ключе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Осипович, 1841—1911)，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俄国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主要著述有《俄国史教程》、《古罗斯贵族杜马》等。——译者注

② 即瓦列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索洛韦伊(Соловей, Вале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960—)，历史学家，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评审人。——译者注

不是客观性的反悖,而是它的最为重要的前提。关于这一点,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极其明了,他们的口号是:my country—right or wrong! (这是我的祖国,无论它正确与否!)超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表现得更为激进:请你热爱美国,或者快点离开!而关于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等等,也是一样)书写本国历史的风格,实在不必谈及。英国一位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曾将其称作富于侵略性的自吹自擂。”自吹自擂,这不是俄罗斯风格的特征。

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科学履行着极为主要的社会功能——促进人民的历史记忆的保存与丰富;首先是对遥远的和不久之前的过去所发生的那些伟大事件的记忆,对先辈们的英名与伟业的记忆。“当我们热爱祖国并为她而自豪时,那便意味着,我们是在为祖国的伟大人物们,即那些使祖国在历史的舞台上变得强大和可敬的人们而感到自豪。”俄国著名院士伊·彼·巴甫洛夫^①曾如是说道。历史记忆本身亦履行着社会聚合功能,巩固着一代代人的团结统一,营造出共同历史命运和历史责任的观念,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健康,滋养着民族自豪感。依此视角而论,让史书由一些代表性人物既要捍卫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亦要从建国之民族的价值观出发来书写,看来是重要的;因为,“书写历史之人,乃是考查现实之人”(英国电影导演肯·洛克斯语)。

蔑视历史,有害于它的缔造者,因为,诚如 20 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和诗人托马斯·艾略特所言:“真实的未来,只会建立在真实的过去之上。”对待历史的虚无主义,对历史的贬损,将过去描写成“黑暗的”、“可恶的”、“阴森的”、“不堪忍受的”,并据此俄国政府于 1917 年革命后批准中断中小学和大学的历史教学——所有这些,并没有持续很久,这很能说明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初,俄国历史重获用武之地——当局为了论证自己在历史中拥有一席之地之权利,曾不得不证明:自己肩负着引领国家朝着造福公民方向发展的使命,且能比先前的统治者更出色、更有效地应对这一使命。只是当这个政权作为俄国千年历史合法继承人

^① 即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Павлов,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1849—1936),著名生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理论创立者,1907 年起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曾获 1904 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译者注

而获得承认时,领导者们方才得以与人民聚合一处;亦只有在这时,政府方能够先期获得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支持——这种情怀能在严峻考验关头捍卫祖国,能使国家卓有成效地发展,能确保国家的福祉。

我国历史在八月革命后的某一时段,亦曾一度不受敬重。一段时间过后,鲍·尼·叶利钦曾言道:“1991年时,我曾经把使整个现实生活急速转弯并倒转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而给自己确定下来。因此,我选择了一个完全不推崇过去并应当只是去建设未来的团队。”叶利钦—盖达尔^①政府外交部长安·弗·科济列夫^②写道:“我们的‘超级使命’,简直就是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拖入……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的俱乐部。”俄国革命改造的不可逆性,曾经要求甚至是以丧失国家主权为代价来作为保障的。

叶利钦的国际关系重要专家加·瓦·斯塔罗沃伊托娃^③,赞同美国的“文明国家俱乐部”主张。依照这一主张,几个“文明”国家要构建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它拥有自己的新闻出版、法院,并承担起道义的权利和在任何国家内确立“新秩序”的义务。B.科列帕诺夫教授曾建议应同意由一些发达国家对昔日苏联实行一定时期的殖民地化。他认为,对西方来说,“我们作为一个富有原料和人力资源的市场,是有意义的……自然,应当向西方请求将个别共和国和地区指定给一些发达国家来负责。譬如,将俄罗斯指定给美国和日本来负责,将乌克兰指定给英国来负责,将白俄罗斯指定给法国来负责。应当成立一个综合性的殖民地行政管理机构”。

① 即叶戈尔·季米罗维奇·盖达尔(Гайдар, Егор Тимирович, 1956—2009),俄政要,经济学家,叶利钦经济变革初期的主要思想家与领导者之一,曾于6个月的总理任职期间启动私有化、市场经济、自由价格和自由外贸制;别洛韦日协议筹备参与者。——译者注

② 即安德列·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Козырев, 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951—),苏俄外交家,任此职时间为1990—1996。此前任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管理局局长(1989—1990)等。——译者注

③ 即加林娜·瓦西里耶芙娜·斯塔罗沃伊托娃(Старовойтова, Гали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1946—1998),俄国政要,曾为苏联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后任俄联邦总统国际关系问题顾问(1991—1992),1998年起任民主俄罗斯党主席,1998年11月死于政治暗杀。——译者注